

近代出版家張元濟



王紹曾著

商務印書館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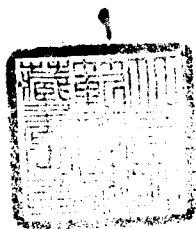
王绍曾著

2100150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1500



商务印书馆

1984年·北京

1001500

JĪNDÀI CHŪBÁNJIǎ ZHĀNG YUǎN-JĪ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

王绍曾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0017·13

1984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03千

印数 5,700册

印张 4 5/8 插图1

(60克纸本) 定价: 0.73 元



张元济先生

目 次

前言.....	1
一、张元济先生的家世和生平.....	3
二、近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19
三、从戊戌新文化运动到“五四”前后.....	48
四、整理出版古籍的丰硕成果.....	57
结束语.....	138
后 记.....	140

前 言

一九一六年八月的一天，一位年青人推门走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室。室内简单朴素，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堆着许多中英文书报。经理是位五十左右的人，细眉长目，满面红光，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青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在英文部工作，年青人作了肯定的答复以后，他以流利的英语用电话通知了编译所英文部长邝富灼先生。^①

这是六十多年后茅盾同志^②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他第一次见到当时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译所长张元济先生时的深刻印象。

茅盾同志以他的亲身感受在回忆录里接着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③这是对张先生一生的高度概括。茅盾同志充分肯定了张先生在文化出版事业上的功绩和他在史学、文学上的高深造诣。尽管张先生不象乾嘉学者那样在群经子史方面写下许多专门性的巨著，但是在他为商务印书馆主持古籍的收藏、整理、出版的过程中，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神

①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上册 10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茅盾姓沈名德鸿，字雁冰，一九二〇年后以字行；一九二七年后用笔名“茅盾”。

③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上册 109 页。

财富。先后整理出版的有《校史随笔》(一九三八年商务排印本)、《涵芬楼烬余书录》(一九五一年商务排印本)、《涉园序跋集录》(顾廷龙编,一九五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一九八二年商务印书馆又整理出版了《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尚待出版的还有《张元济诗文》。茅盾同志所说的《百衲本二十四史》跋文和《涉园丛刊》的序跋,都已收入《涉园序跋集录》。张先生在主持校勘史记时撰写的《校勘记》(分装百数十册),是凝聚了张先生十多年心血的一个巨编,可惜因为卷帙浩繁,至今未能付印。

张先生是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是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家,又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和校勘学家。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一九五九年逝世为止,在半个多世纪漫长的岁月中,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严谨的治学态度,朴素的生活作风,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楷模。

我对张先生说不上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对张先生在近现代文化史、出版史、学术史上所作的贡献,更缺乏全面的了解。每当想起三十年代初追随先生校史,谆谆训诲,记忆犹新;近年阅读先生著作,感受尤深,总想写一点东西来表达对先生的敬意。然而拿起笔来,又未敢自信。由于顾起潜(廷龙)先生的亲切关怀,商务老同仁丁英桂、胡文楷两同志和张树年同志(张元济先生哲嗣)的热情怂恿,我终于不揣冒昧写成了这本小书。自知水平有限,掌握的资料不足,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发生舛错。但是我想:如果通过这本小书,能对张先生的一生有一个粗略的认识,我的夙愿也就实现了。补苴罅漏,请俟异日。

一、张元济先生的家世和生平

张元济先生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先生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名森玉，字云仙，号德斋，在清同光间历署广东省会同、陵水等县知县。张先生的童年是在粤东度过的。直到十四岁（1880年）才随同他的母亲回到海盐原籍^①。

海盐张氏在明代就是一个望族。张先生的十世祖奇龄（字符九），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举人，曾主讲虎林书院，学者称他为大白先生。九世祖惟赤（字君常，号螺浮），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做了几年京官就引疾归田，绝意仕进，曾就大白先生读书之庐拓建为园，这就是后来以藏书、刻书著称的海盐张氏涉园。嘉道之际，江浙名流学者如吴騞、鲍廷博、陈鱣、黄丕烈等，都曾向张氏涉园借书雠校。六世祖宗松和宗松诸弟宗楠、宗棣、载华都长于诗词，又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流传到今天的《王荆公诗笺注》、《带经堂诗话》、《词林纪事》、《初白菴诗评》等，都有海盐张氏涉园刻本。最为张先生所称道的是九世祖螺浮官京师时直言敢谏的立朝大节。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康熙冲龄即位，权奸秉政，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请玄烨亲政；另一件是，清朝入关之始，对汉族每多歧视，他抗

^① 《涉园序跋集录·海盐张氏涉园丛刊》（以下简称《集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颜上疏,称“刑部审鞠录供,不宜但凭满官执笔”,同时奏请不许满洲贵族再圈占民地。这些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张先生在童年时,他的父亲就以诵习螺浮公的奏议《入告编》相嘱咐,要他以螺浮公为立身处事的榜样。^①这对张先生的品德和一生事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张先生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刑部主事,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章京。

中国自从鸦片战争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洋枪洋炮打开了大门,签订了一批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不少有识之士对清王朝的腐朽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改革现状和抵御外侮。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面,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张先生目睹清政府的昏庸颡顽,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深感非变法不足以图存。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和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人,经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②他和当时许多上层知识分子一样,深感“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从此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他意识到当务之急,“总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一再敦促他的知己朋友汪康年开办学堂。张先生所说的“鼓动人心”,就是要创办报纸,开设书局,用以启发民智。开办学堂,目的在于培养“贯通中西,兼知他项西学”的人材。他说:“今日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他和汪康年相互勉励:“吾辈今日做

① 《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附录《张氏世系》(顾廷龙编);《集录·海盐张氏涉园丛刊》。

②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 323 页。)

事,但求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①为了实现他“以身先之”的诺言,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和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经、夏偕复等人合力创办了一所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他自己也在其中学习英语^②。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和严复交往,通艺学堂的校名,就是严复所题的。严复的侄儿严君潜,就在里面当教员。张先生曾邀请严复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严复还曾在通艺学堂发表讲演,阐述“西学门径功用”,很受欢迎。^③在创办通艺学堂的同时,对于汪康年、梁启超在上海倡办的《时务报》,给予热情支持,并在北京代为分发。

当时张先生是总理衙门的章京。总理衙门主管外交事务,还兼管学堂、铁路、开矿、造船、海防等事项。章京是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章京中懂洋文的只有张先生一个人。有一次俄皇尼古拉二世,给光绪来了一个电报,照例应该马上进呈给光绪的,由于司务厅(即收掌处)的官员不识洋文,在一大堆公文里压了两天,给张先生发现了,这才通知帮总办瑞良,由同文馆学生翻译后送上去。^④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光绪不断受到维新思想的冲击,他渴望阅读新书,经常开列书单,交总理衙门进呈,总理衙门照例委派张先生办理。当时京师书铺新书极少,张先生往往以篋中所有,并向知友乞假,凑集进呈。有一次光绪索阅黄遵宪撰的《日本国志》,也是张先生把书送上去的。张先生在《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中有一首诗:“天禄石渠非所眷,喜从海外听瀛谈。丹毫不厌烦挥

① 《张元济书札》(以下简称《书札》)第13、16、20页《致汪康年书》8、10、12。

② 张先生在年轻时即“略识洋文”,1905年又跟爱尔兰医生柯大夫学习英语。

③ 《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325页);《书札》第10页《致汪康年书》3;陈应年《严复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八,以下简称《馆史资料》)。

④ 《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324、326页)。

翰，诏进新书日再三。”^①说的就是进书这件事。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阴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在维新派的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这是实行新政的开端。光绪在上谕中明确宣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对于那些守旧大臣，“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的谬论，痛加驳斥，并首先提出进行教育方面的改革。^②就在诏定国是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阴历四月二十五日)，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光绪命康有为和张元济于六月十六日(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进见。这一天黎明，康有为和张先生被召引入宫，康有为先进去，接着张先生进见。光绪询问了张先生办理通艺学堂的情况，勗勉诸生为国家做事。又从滇越边界事件谈到修铁路和办外交的重要。张先生建议要认真注意造就各项人材，不论铁路、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都得有自己的人材，不能依靠洋工程师；尤其要重视培养翻译人材和使领人材。光绪在召见时一再要他“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张先生因为发现御座后窗外似乎有人在窃听，就没有敢多谈。张先生当时即已觉察到“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旧党之阻挠”，^③“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维新变法难免不遭到失败。^④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仍然追随六君子于鞏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⑤七月三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创办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大臣，

① 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戊戌变法》第四册 350 页)。光绪命枢臣进《日本国志》，据《翁文恭公日记》时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二十三日。

② 《戊戌变法》第二册 17 页《上谕》45。

③ 《戊戌变法》第二册 20、22 页《上谕》48、55；《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 324—325 页)；《追述戊戌政变杂咏》(《戊戌变法》第四册 351 页)。

④ 《书札》第 45 页《致汪康年书》34。

⑤ 《集录·戊戌六君子遗集跋》。

官书局及译书局亦并归管辖。孙奏准派张先生为大学堂总办。张先生“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且“恐变为官事，步官书局之后尘”，故“极力辞退”。^①

同年七月十六日(阴历五月二十八日)，光绪下诏求言，允许各部司员上书言事。张先生鉴于新政的难行，外患内忧相逼而至，他为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所驱使，于九月五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张先生首先对诏定国是以来廷臣的因循守旧、欺罔蒙蔽，以及刘坤一、谭锺麟的复奏迟延，怀塔布等的阻塞言路，提出了抨击，接着列举了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条陈和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共列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总纲五条是：一、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二、融满汉之见；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人之格；五、善理财之策。总的精神是要变官制，废科举，去发辮，除拜跪，消满汉界限，许满汉通婚^②。其中有些意见，是很大胆的。例如清政府各衙门堂官，向来是满汉并列，满官为正，汉官为副，而大权都在满官手中。张先生认为“满汉诸臣，不宜各分畛域”。“各衙门堂官，有满汉并列者，统宜裁减，只留一人。满而贤能，去汉留满；汉而贤能，去满留汉”。这个主张实际上就要去掉不能胜任工作的堂官。又如重迭臃肿的国家机关和无所事事的大小冗员，他认为均应痛加裁汰。他说：“今日之官吏，上焉者不过循分供职，余皆殃民蠹国之徒耳。”“现在宜多裁旧衙门，增设新政衙门。有军机处，何必有内阁；有大学堂，何必有国子监，皆重沓无谓。”他认为翰林院人员最众，所办事件，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太常寺专司祀典，亦可并入礼部。关于请废翰林院，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曾经提到这件事，黄遵宪《己亥续怀人诗》的第四首是怀念“海

① 《书札》第45页《致汪康年书》34。

②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2—49页。

盐张元济”的(见黄氏自注):“金华讲殿共论思,圣祖文宗旧典贻。指问鸡栖庭下树,可容别筑凤凰池。”^①写的也是张先生请废翰林院这件事。

张先生是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使他最感兴趣的是:“泰西各国行政与议政判为两事”,认为“意至良,法至美。”他反对中国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以行政之人操议政之权。今日我议之,明日即我行之。”主张“臣工条陈时事,及各衙门请旨之件”,先交议政局核议,“议上请旨施行”。张先生所说的议政局,还不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但他的性质是类似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张先生所向往的自然还只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

尤其值得令人注意的,张先生在这个奏折第五条“善理财之策”中,提出了“整圉法”和“重商权”。所谓“整圉法”,就是要求改革币制,废银两为金银币。建议在京师设立铸币局,“专铸金银钱,参用西制,酌定分两成色,并兑换行用之法,颁之全国,定期施行,庶几圉法整齐,而银行可设,钱票可行,商务大兴矣。”张先生认为“此事为国家命脉所系,不可目为琐屑而忽之。”他指出:当时“收发官款,多以银两为准。何以喜用银两?为其有平余,有成色,司其事者,可以从中渔利也。于是奸商操其奇赢,而国家之权尽失矣。”

所谓“重商权”,就是要保护私人资本,奖励投资,振兴工商业。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我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过大部分民用企业,都在洋务派的官僚控制之下,主要采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也有少数是官商合办的,这些企业都带有较明显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经营管理权完全落在官僚买办手中,成为他们营私舞弊的利藪,压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张先生

^① 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戊戌变法》第四册 357页。

说：“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今知重商矣，又好为官督商办之说。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腴商为事者也。故富人无肯出巨资以办商务者。今京师既设工商总局，宜责其扫除官气，实力保护，不得稍有抑制。无论商民有事，许迳禀总局，总局办理不善，许援士民言事之例，直达御前。商律亦关紧要，宜速行议定，俾资遵守。”张先生所说的“腴商”，就是剥削民族资本，它的后果，必然“无肯出巨资以办商务”。这种例子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可以说屡见不鲜。例如一八七八年，候补道彭汝琮准备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筹建，结果就没有招到股本。^①在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张先生主张学习西方，希望通过清政府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对民族资本采取保护性措施，使我国在“商战世界”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和早期的改良思想家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等人的看法有共同之处。^②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洋务派官僚买办垄断民族企业的民主思想。

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日），张先生又上《为新政衙门酌设缺额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折》。因为当时张先生以总理衙门章京兼理新设立的矿路总局事务。传闻矿路局所设缺额，将以被裁撤各衙门的官员来补充。张先生以为新政“造端伊始，宏巨艰难，襄事各员，非得讲求有素，才识卓著者，断难胜任。现裁各署，其实缺候补各员，大都衰庸猥滥者多，部胥市侩杂出其间，能通晓中国旧学者尚难得一，若令备员充位，从事新政，岂不贻误国是，

① 《中国近代史》194页，中华1977年版。

② 参考《中国近代史》205—207页。

腾笑远人”。在张先生看来,这是一种蒙头盖面的恶习,“如皇上废八股,则请试四书义;皇上改武科,则请留弓刀石,无非同一伎俩”,“使新政不得畅行”。因此他坚决主张:“凡新设缺额,令中外大员,不拘资格,切实保荐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①张先生在用人问题上主张破除情面,裁汰冗老,拔擢真才,发挥专长,反对蒙头盖面,滥竽充数,这对推行新政来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和昏庸腐朽的“中外大员”身上,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戊戌变法是维新派和守旧派在政治上一次重大的较量。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顽固的守旧派的百般阻挠和反抗,以及维新派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得变法运动势必迅速归于失败。就在张先生带领通艺学堂的学生到日本使馆去访问来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教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的那一天(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日。),慈禧已经宣布垂帘听政,进行反攻。康、梁远遁国外;接着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被杀;侍读学士徐致靖,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等下狱,湖南巡抚陈宝箴被革职。张先生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自然也不能例外。十月八日(阴历八月二十三日)他和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一起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②据廖仲山后来告诉张先生,他之所以与王、李并案处理,仅受到革职的处分,光绪隐有保全之意。否则一旦受人弹劾,免不了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③张先生自己回忆:“在当时环境之下,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断断无成功的可能。当时我们这些人要借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

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5—196页。

② 《戊戌变法》第二册 108页《上谕》281;《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四册 326页)。

③ 《追述戊戌变法杂咏》(《戊戌变法》第四册 354页)。

运，到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梦想。”^①同时他从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②但是他深信只要启迪民智，就会有更多的人接踵而起。他被清政府革职后，来到上海，把他的全部精力投入我国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原因就在这里。

张先生被革职后，李鸿章为了笼络维新分子，特地派于式枚去慰问他，表示好感，并把他介绍给正在上海办理南洋公学的盛宣怀。南洋公学成立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附设译书院，盛宣怀延请张先生去任译书院院长。后来南洋公学总理何梅生病故，由张先生继任总理。因为在办学方针上，跟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美人福开森意见不合，难于共事，不久便辞职。^③一九〇二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此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担任编译所所长（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八年九月）、经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〇年）、监理（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六年七月）、董事长（一九二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九年八月逝世）。

张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就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看到鸦片战争以来“政教之不修，举数百万里之沃壤，任人刳割，莫敢谁何；租赁之地，遍于口岸，深入腹地；外人舰队，出入无禁；设营置戍，悉惟其便”，仅仅九十年而形成“日蹙之势”。他怀疑自今以往，其仅存之版图，是否能永无残阙，恐尚在不可必之数。故切望凡我同胞，均应“忧勤惕励，而谋所以保兹疆土之策。”^④

在中国铁路权利遭到帝国主义无情掠夺的时候，他对某些浙

①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2—49页，195—196页；《戊戌政变的回忆》。

② 《集录·戊戌奏稿》。

③ 《戊戌政变的回忆》；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之六）。

④ 《集录·大清一统志》。

绅与德商合办暨浦铁路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我国未能收治外法权，华洋合股，利害本不相敌。铁路于民有无数密切之关系，流弊尤甚。”现“甬沪一线已归英商承办”，呈词谓“虑其独擅利权，设法牵制，”意在“借德人以相抵制”。“不知德人行政专以帝国主义为准，其进取之手段视英尤急，引与英抗，正无异招虎以拒狼。”他说，“洋股非不可合，而在我主权日削，外力增进之中国，则不可合；而强权自逞，凌厉无前之德人，尤不可合。”他要求浙人勿蹈山东胶济铁路的覆辙。否则无数虎狼入我窟室，“我浙西人又将为山东之续”。^①直到一九一三年，他还建议张謇必须对进口货加税，认为外资在国内制造香烟，目的在榨取国内廉价劳动力，“痍民害国，不可不以重征困之。”^②一九一九年，北洋政府对归国华侨苦心经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非但不加保护，反而多方刁难，横加限制，张先生对此严厉抨击：“北廷无道，何足深责，然使数千百万之华侨引为前车，因而裹足，则于吾国诚有碍害。”^③张先生就是这样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保护民族资本和归国华侨的正当投资而仗义执言。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看到濒于破产的农村，苛捐杂税名目之多，地方俗吏的胡作非为，一而再地发出正义的呼吁，希望减轻人民痛苦，发展农村副业，改善农村经济。尤其使张先生感到惊诧的，那些所谓“亲民之官”和高高在上的“建设厅长”之流，足迹从不入农村，对农村一无所知，居然下令严禁宰剥浙江农民赖以生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胎羊皮，妄言屠宰胎羊、乳羊，过于残忍。断浙西农民之生计，无视其沦为饿殍而奢言屠宰胎羊为残忍。张先生毫不用情地指责：“今人有恒言，曰：农村破产。农村岂真易破产

① 《书札》49—50页《致沈洁斋书》和《请中止暨浦铁路节略》。

② 《书札》67页《致张謇书》2。

③ 《书札》69页《致岑春煊、伍廷芳书》。